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ZHONGGUO RENMIN KANGRI
ZHANZHENG JINIANGUAN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张承钧 ◎ 主 编

刘建业 ◎ 副主编

上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燕山出版社

K265
22-1
· 纪念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丛书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张承钧 ◎ 主 编

刘建业 ◎ 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纪念卢沟桥事变 70 周年丛书 ·

编 委 会

顾	问	白介夫	孙平化	李东冶
		周冠五	段苏权	焦若愚
主	编	张承钧		
副	主 编	刘建业		
编	委	于延俊	刘建业	吕淑平
		李 深	张承钧	陈 静
		段晓微	栾熙昌	
执行编辑		陈文寿		

前 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综合性学术文集。它的宗旨是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抗日战争，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教育后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永久和平。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弱到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国从此结束了在异族入侵时的屡败历史，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胜利；并以重要的同盟者身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自由和民主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抗日战争必须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既可以采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传统方法，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现代方法。只有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科学探讨，才能向人们提供正确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的阐释，促进人们深刻地了解抗日战争，客观地评价抗日战争。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江泽民同志的讲话非常精辟地实事求是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

抗日战争的内容格外丰富，值得开拓和深入探索的课题很多。国际学术界和台港澳学者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值得汲取和借鉴。但是，东施效颦、人云亦云，只会扼杀创造性，永远落后。我们主张开展创造性的研究，运用新方法、新手段，建立具有特色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热忱欢迎国内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以此为园地，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开展争鸣。

张承钧

1991年10月

目 录

学 海 撷 珠

- 关于“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的思考…………… 林治波(1)
- 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几个问题…………… 【日】安井三吉著
李倩译(13)
- 关于《八一宣言》前后张闻天的统战思想…………… 李良志(24)
- “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对日政策论评…………… 刘 侃(35)
- 试论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的美国远东政策
观及其对日持久战思想的形成…………… 周建波(58)
-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人武装抗日斗争简述…………… 杜万启(82)
-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社会各界的难民救济…………… 孙艳魁(88)
-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李劲松(99)
- 论 1944 年日本“一号作战”对中国的影响…………… 【加】徐乃力(116)
- 抗日战争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冲击…………… 老冠梓(124)
- 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的统治与暴行…………… 齐福霖(135)
- 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山东的侵略…………… 王兆良(148)
- 日本在华特务情报机构(一)…………… 逢复等编著
刘建业审校(161)

译 文 资 料

-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中)
——亚洲、太平洋战争研究引论…………… 陈文寿(183)
- 近四十年来日本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述评…………… 【日】冢濑进(214)

- 日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要 【日】藤田正典著
陈慈玉编译(224)
- 台湾抗日战争史研究论著举要 胡平生(230)
- 天羽声明与欧美各国之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译 冯斌编译(240)
- 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投降前后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选译 程宏编译(265)

名人传记

- 抗日战争人物小传 陈静 胡学亮 要秋霞(284)

学术信息

- 正视抗战史的研究(摘要) 张玉法(294)
-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京成立 吉 音(297)
- “九一八”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要秋霞(300)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推出重要展览 王 玉(305)

博物馆内

- 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诉说着什么 【日】中江要介(307)
- 访日琐记 刘建业(311)
- 抗战馆深化社会教育的新尝试 延 军(315)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91 年大事记 (319)

学海撷珠

关于“七·七”事变和“七·七” 抗战的思考

林 治 波

忘记历史，就注定要重蹈覆辙。“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五十多年的悠长岁月里，物转星移，世局变幻，中国、日本以及中日关系史都已跨入了新的时代，但是，作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永远不应被遗忘。

—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短短的二十几天内，文化古都北平和北方重镇天津接连告失；其后，日军又长驱直入，连陷冀察，铁蹄到处，人民尽遭践踏。在仅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半壁江山（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城市 340 余座）沦入敌手。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战场的这种退却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教训？

斯大林曾经指出：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交战的一方为了解救自己军队的骨干，把它们从敌人优势兵力打击下撤出来，而开始实行有计划的退却，不经过战斗而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以便赢得时间和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新的决战。”^①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

御阶段，中国军队根据“持久消耗”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总体战略，放弃若干国土和城市，实行战略防御和战略退却，这是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防御和退却必须在保存大部有生力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迟滞敌之进攻和予敌以消耗才算是合理的。而“七·七”事变后的十五个月里，虽然广大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对日军的猖狂进攻进行了英勇抵抗，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军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消极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它损失了大量兵力，失去了大片国土，却未能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达成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使国家经济 and 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仅以平津失守为例，略作剖析。

第一，长期妥协退让，埋下误国祸根。

自晚清以来的历朝统治者们，经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妥协退让，丧权辱国，造成了积重难返的不利局面。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利用了晚清政府的软弱腐败攫取了在中国的驻兵权，其中仅日本就有三支庞大的武力驻扎于中国各地。这种局面已经对中国的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让敌，尔后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军对热河的侵占。从此，华北门户洞开，冀、察、平、津完全暴露于虎口之下。热河作战前夕，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向政府呼吁：“热河一失，长城为界，平津必不能保”^②。但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未因热河失守带来的危急局面而稍有改变，复于1935年与日本侵略者达成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与此同时，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作为一个对日妥协的产物而出现在华北，冀、察、平、津变成了半沦陷地区。在此后的两年中，由于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退让，日本侵略者不仅实现了大规模增兵华北，扩大军事占领的目的，而且打着“经济提携”的名义，以种种卑鄙手段攫取了对华北战略资源开发和铁路运输业务的大部分控制权，垄断了冀、察、平、津的电力供应，并取得了在该地区的航空特权，从军事意义上大大强化了对华北的控制。

在上述形势下，宋哲元虽拥兵十万，但已被极大地束缚了手脚。所以，有人认为“平津之失，非战之罪”，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企求就地解决，保存地盘、实力。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挂上了青天白日旗，但真正的统一远未实现。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仍拥兵称雄，各霸一方，处于半独立状态。宋哲元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与蒋介石中央政府存在着矛盾的地方实力集团，它拥有29军这样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日蒋矛盾而谋取了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地盘，建立了一个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实力与地盘是一切军阀的命根子，在任何条件下他们都会竭尽全力地加以保护。利用对日局部妥协和日蒋矛盾发展个人实力，使宋哲元尝到了甜头。因此，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等人虽然表示了一定的抗战决心，但很快又滑向妥协退让的老路，在日军源源增兵的紧急形势下，仍不厌其烦地与日方进行交涉，企图以小的妥协换取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实上，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并非一无所知，也认识到“中日必有一战”，但是保存地盘和实力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致利令智昏，心存侥幸，指望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全局的和平。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宋哲元居然通电拒绝各地同胞劳军捐款，下令拆除北平各地的防御工事，开启所有城门，搁置备战计划。但事实却无情地证明，这种近乎宋襄公式的、一厢情愿的诚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北平军民的思想戒备，使许多歼敌良机失之交臂，而且为日军的缓兵之计提供了时间。这个严重的教训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同志的教诲：“我们在采取和平步骤的同时，也应当全面加强我们的战备，……要善于完成那个在日益疲惫的情况下迫使我们把和与战两者结合起来的任务。”^③宋哲元等人忽视了这一点，致使局面日益被动。直到廊坊、广安门事件发生，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才感到和平绝望，大战临头，下令各部奋起抵抗，但此刻为时已晚。在既保地盘又保实力已属不能的情势下，宋哲元转而以保存实力为主，29军各部没有经过大战即纷纷撤离平津。因此，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29军并没有被日军击败，他们在撤离平

津时，主力部队仍基本完好。应当指出的是，宋哲元集团祈求和平、保存实力的作法，也与国民政府的政策相关。其一，利用杂牌军打头阵，乘机消灭异己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这促使任何一支非嫡系部队都不能不警惕。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指派应援华北前线的部队不是中央军，而全属非嫡系部队，这也使宋哲元顿生疑惧之心。其二，在蒋介石政府不准备进行全国抗战的条件下，同日军死战，把部队拼光，结果只是为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殉葬而已。这是宋哲元等人从反面总结了长城抗战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表示“应战”，但实际上仍意存观望，和战不定，幻想国际干涉，谋求局部解决。直至平津失守，仍没有任何一个有力的处置措施能够切实表明国民政府决心进行全国抗战。这种情形显然对29军将领产生了消极影响，加深了宋哲元等人的迟疑和动摇心理。直到7月31日，北平市长秦德纯还在致电蒋介石，询问“和战”问题。^④这实在是不应出现的奇怪现象。

第三，实行消极防御，处处被动挨打。

政治上的妥协退让，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消极防御。本来，在“七·七”事变初起至23日以前，29军与日军相比，占据相对优势。当时，29军总兵力不下十万，主力部队的军事素质和精神素质都不在日军之下，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更是日军所不具备的，如果实行张克侠“以攻为守”的积极防御方案，战局必将大有改观。但29军高级将领为了配合和平谈判，防止事态扩大，竟命令前线部队“只许抵抗，不许出击”。蒋介石也抱着同样的态度要求29军“固守宛平，就地抵抗”；7月13日又再电29军，要求“处处固守，时时严防”。从“固守”、“抵抗”、“严防”等字面上看，南京方面似乎十分坚定，但其消极防御的实质与冀察当局毫无二致。这种划地为牢、消极防御的方针，束缚了爱国官兵的手脚，挫伤了他们的激昂士气，当时，驻守卢沟桥地区的第110旅，会同从保定赶来增援的两个团和两辆装甲车，准备于7月11日围歼丰台之敌，以拔除日军的前进据点。全军摩拳擦掌，士气高涨，但军部却于此时下令说：“撤兵办

法已商妥，不得妄自进攻。”于是，一个宝贵时机又白白地放过了。同样，事变爆发后，驻于天津、廊坊一带的38师也本应纵兵出击，进攻日军在天津的大本营，以配合北平地区的37师，使日军顾此失彼，难以应付。遗憾的是，38师也在就地坚守的方针下，长时间按兵不动，消极待敌，没有及早发挥应有的作用。29军各部的作战，正是在和平交涉的掣肘上断断续续，犹犹豫豫，错过了许多克敌制胜的良机。守卫卢沟桥的吉星文团长曾惋惜地说：“这次卢沟桥战事，我们只是挨打，人家打我们的时候多，我们还打的时候太少”^⑤。这种状况不禁使我们记起了恩格斯在分析1870年德法巴黎之战法国守军失利原因时的一段话：“全部防御行动的犹豫不决，萎靡不振和软弱无力，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于军队的素质低劣。……不是军队，而是总司令的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使得胜败关头形势变得不利于被围者。”^⑥可见，历史有时是多么相似。

总结平津失守的原因，使我们痛切地感到，平津的失守十分典型地、集中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家分裂、经济落后给抗战造成的恶果。平津失守的教训说明：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下祈求和平，无异与虎谋皮，只有操枪奋起才能杀出一条生路；国家的分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必将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在抵抗侵略的军事斗争中，必须实行积极防御，专守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另外，“七·七”事变的历史还证实了这样一个论断：“侵略国是进攻国，它们对于进行新的战争通常都是比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准备，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愿进行新的战争，通常都是很晚才去备战。……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规律性，不估计到这个规律性是很危险的。”^⑦

以上便是“七·七”事变最主要的历史教训，也可以说是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历史教训。

二

“七·七”，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含义殊深的日子。虽然“七

·七”事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但“七·七”抗战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这熊熊燃烧的烈火，化作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将中国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欺侮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但这些斗争都相继失败了，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摧残和压抑。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凶恶的敌人。它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挑起“一·二八”事变逼签《淞沪停战协定》，进犯热河逼签《塘沽协定》，策动华北事变逼签《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向上海和华北各地大肆蚕食、渗透，出现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而中国政府节节退让的可悲局面。“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拉开了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给奋起抗战，不甘屈辱的29军官兵以高度评价，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愧是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虽然误信和平，处置不当，招致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在和战的最后关头，他们坚持了宝贵的民族气节，断然拒绝了日寇的威胁恫吓，踏上了抗日卫国的光明大道，也受到了后人的钦敬和赞扬。尤其是张自忠，在奔赴抗日前线后，率部奋起杀敌，屡建战功，最后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经典作家告诉我们：“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⑧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定和团结一致方面，都胜过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也告诉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分裂也要挨打。日本法西斯之所以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因为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处于内战之

中，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只要国家分裂、内战不息，不能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那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任何局部抵抗，都必然以妥协失败告终。“一·二八”抗战是如此，长城抗战亦复如此。祸深寇亟，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呼吁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号召全国一致对外。“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倾尽全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述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参加抗战，成为领导抗日的先锋力量。应当指出，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对于促成全国抗战也起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主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人民大众两种力量的制约。一方面，它同人民大众有矛盾；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前者决定了它有对日妥协的一面，后者决定了它有对日抵抗的一面。当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危及它的统治时，它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其统治时，它又被迫采取抵抗政策。“七·七”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进攻，而蒋介石政府却仍然动摇于和战之间，这说明它对于日军的新侵略是否意味着要灭亡全中国尚无认识，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的侵略战火迅速蔓延，首都南京岌岌可危之时，国民政府才感到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正式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成了全国抗战。抗战初期，尤其是在华北战场，国共两党两军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杀敌，共御外侮，充分显示了合作的威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合作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带动了全国的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用汗水、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谱写了气吞山河、威震寰宇的瑰丽篇章，并最终取得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所以说，侵略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家的分裂、民族的不和；只有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捍卫主权，才能使一个民族

兴旺昌盛。“九·一八”事变从反面，而“七七”抗战则从正面证实了这个真理。

国民党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有过反共反人民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有兴有衰。事实证明，顺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则衰。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和它所执掌的国民政府之所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政治威望空前提高，其原因就在于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进步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今天，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使命又历史地摆在国共两党面前。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四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审时度势，摒弃陈见，顺应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尊重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做出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明智抉择，推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使众望所期的祖国统一局面早日到来，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宏图大愿：“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

在历史的长河里，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持续了两千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只是近百年来事。但这后一百年的不幸历史对于中日两国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先生所指出的：“后一百年远比前两千年具有更重要的内容。因为近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也被后来直至现在连续不断的侵略和反华的一百年历史给葬送了。”^⑩真可谓“百日之功，毁于一旦”。尤其是“七·七”事变，导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使中日关系史进入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这是日本法西斯的罪责。

日本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德意法西斯不同，日本法西斯不是采取武装政变颠覆宪政体制的形式夺取政权的，而是以军部为主导，在酝酿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实现总体战略的过程中，通过逐步干预政治、操纵现存政府，最后建立了

军部掌握实权的法西斯体制。但是，“不管法西斯主义戴着什么假面具，采取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上台执政，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极端残酷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蛮不讲理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⑩季米特洛夫的这段论述精辟深刻，切中要害。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全部侵华历史都表明，在灭亡中国的总目标下，日本法西斯内部尽管存在着以何种手段、在什么时机为最佳的争吵，尽管不同时期的侵华方针各有侧重，但其总目标却从未改变。只要日本帝国主义不放弃灭亡中国的总目标，而中国人民又不甘屈服，那么日本法西斯最终必将采取极端的手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历史性错误，就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里，中国虽然仍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的地位，但还是在沉重的枷锁下艰难而不断地进步着。这些进步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民族觉醒、民族解放的浪潮日渐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总之，此时的中国已大大不同于晚清和北洋时代。然而，日本法西斯“大多不明了世界大势，也不明白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含有如何的意义。他们只认为‘中国就是中国’，头脑里仍存着历史上对中国的印象。”^⑪即便是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如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矶谷廉介等人，也同样没有把握中国的进步趋势。事变爆发前，他们只知道以离间分化和金钱收买的腐朽手段，利用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无耻的汉奸、流氓来制造分裂、叛乱、颠覆活动，企图不战而屈我，但他们的目标并未得逞，事变爆发后，他们又轻狂地鼓吹：“只要对中国人一击，就可以瓦解他们的抵抗。”^⑫不料，这“一击”却击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击起了浩荡的人民战争。“一击”不逞，日本军阀恼羞成怒，又凭借其船坚炮利，不惜孤注一掷，扩大战火，结果在人民战争的泥淖里愈陷愈深。“他们显示了一种几乎使人不能相

信的愚鲁”，“被迫着不得不改变战略，不时改变它的目标，增加它的困难，以及扩大它失败的范围”。^④这说明，任何法西斯，都是唯武器论的短视者，最终必定走向失败。

正视历史，才能正视现实。我们重温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历史，并不是要把它的罪行记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国民，包括许多左翼进步组织和自由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了拥护法西斯、支持侵华战争的反动阵营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连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佐野学为首的大批党员及外国组织成员也纷纷投入法西斯怀抱。这说明，法西斯主义者一旦篡夺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操纵了政治、军事、经济、立法方面的大权，掌握了组织、宣传、动员系统，那么他们就会以欺骗、煽动或强制、胁迫的手段人为地树立和扩大自己的基础，将整个国家拉入对外扩张的歧途，从而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之所以能够倾尽举国之力，能够持续八年之久，能够出动数百万大军，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苗头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注意到，直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一些右翼团体和右翼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不仅不反省思过，汲取教训，反而采取回避态度，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这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宽容原谅的。

曾经亲身经历过当年这场侵略战争的日本史学家田中正俊教授，在他的《战争·科学·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战后逐步居其位的统治者们以及与他们勾结着的统治者们，在公开的场合常常毫不在乎地重复着‘过去的不幸历史’等抽掉了主体责任的客观叙述式的欺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干了坏事还装作一本正经的人更为伪善卑劣的了。”他还写道：“近代日本人对亚洲各民族的压迫和摧残，决不仅是加害其他民族的问题，它首先是日本人自身历史的内在人性的污辱问题。成为问题的南京大屠杀，不过是堕落颓废了的日本民族人性玷污的结果而已，问题本来在日本人自身。”“我认为